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Statist
Movement before the WW II*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日〕堀 幸雄 / 著 熊达云 / 译 高士华 /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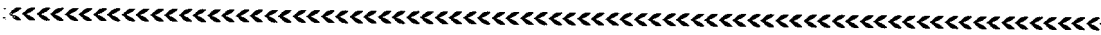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Statist Movement before the WW II

战前日本 国家主义运动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 [日] 堀幸雄著; 熊达云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1391 - 4

I. ①战… II. ①堀… ②熊… III. ①政治 - 研究 -
日本 - 近代 IV. ①D731.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2903 号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著 者 / [日] 堀 幸雄
译 者 / 熊达云
译 校 / 高士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徐志民 徐思彦
责任校对 / 高建春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4.6 字数 / 42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91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8 - 183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努

力。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于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代友好下去。而对于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

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于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

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

堀幸雄和他的日本右翼研究

堀幸雄先生曾经是我的同事。1999年4月我们进入同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在同一个学部里担任教职，直到2003年3月他彻底退休。

堀先生记者出身，1953年青山学院大学商学部毕业进入《每日新闻》工作，1984年退休之后，我们成为同事之前，曾先后的爱媛大学和东北福祉大学担任教授。

可以说，堀幸雄先生是日本最著名的右翼问题专家。他先是出版了《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83年。1993年增补再版），1991年又出版了《右翼辞典》（三岭书房。2006年由柏书房以《最新右翼辞典》之名增补再版），1997年又推出了《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

《右翼辞典》出版后，得到了广泛好评，举凡和右翼有关的人物、团体、事件、运动、专门术语都可以在这里查到，可以说是一部右翼百科全书，是研究日本右翼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战后的右翼势力》和《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两本著作出版的时间顺序与历史本身的发展时序虽然相反，但合起来就是一部战前战后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通史。其实，这样的顺序也是很自然的，作者研究战后右翼，是出于对于现实政治的关心，主要目的是追踪战后日本右倾化的轨迹。但是，堀先生发现，右翼团体虽然在

战后一度被禁止，但从右翼思想来看，战前和战后具有割不断的联系。比如，1927年确定侵略中国方针的东方会议，吉田茂以奉天总领事身份参加，主张对中国强硬；鸠山一郎1933年担任文部省大臣时，发生京都大学言论镇压事件；岸信介战前曾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他们都在战后相继担任首相，都想旧梦重温，挽回旧日的荣光。所以，他寻根溯源，继续追踪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研究右翼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于是，就有了这本《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的问世。

对国家主义（statism）一词，国内的读者一般比较陌生，它强调国家本位，国家至上，可以说是右翼思想中的主要部分。其实，这个词很早就被输入中国，192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就被视为国家主义派。但是，由于国情的差异，国家主义这一概念的语境在中国与日本明显不同，特别是日本战前的国家主义，是和发动战争、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本书翻译开始之前，我曾经和原作者商议，为了简单明了，建议改名为《战前日本右翼运动史》，他也表示同意。但是，由于国家主义是当时推动日本走向战争的各种势力的思想基础，考虑再三，还是维持原来的书名，因为这样更能反映日本在各种势力合力推动之下，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的历史真实。

本书的日文书名是《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戦前の国家主義運動史），这当然是日本的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为了避免误解，在中文版书名中，特地加上了“日本”，即《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作者对国家主义的关注，和他自己的战时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堀先生出生于1929年，从小学开始，天天听到的就是天皇呀，神国日本呀，忠君爱国呀，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中日战争开始后，这种赞美变本加厉，参拜神社成了学校活动的一部分。作者年幼虽然不理解思想动员的含义，但是对于天皇、皇国赞美的怀疑逐渐加

深。到了中学时，对于老师、报纸、收音机所宣传的“神国日本”也不相信了，对军人也越来越讨厌，或者说感到恐怖。但他说自己并不是反战少年，只觉得是战争受害者，讨厌为天皇战死，根本没有加害者意识。

1945年的8月15日，作者正在新宿，听了宣布投降的广播之后，抬头仰望，是让他永远忘不了的蓝蓝的天空。他当时想，谢天谢地，不会被强制到战场去送死了，“捡了一条命，军队再也不能欺压国民，以后大概是言论自由的时代了吧，旧的权威倒了，神国日本死了，疯狂的忠君爱国时代结束了”，真正的人生从今天开始了！（参见《战后的右翼势力》序言）

作者认为，战前的国家主义是“服务于侵略”，可谓一针见血。但他同时告诉我们，日本的右翼不会简单地消失，“它是和日本的风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参见《战后的右翼势力》序言）

他进而指出，国家主义和天皇信仰，是右翼这架车的两个轮子。国家主义横行，和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有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的是“明治维新”而不是“明治革命”，没有形成西方近代那样的“个人的自觉”，建立的也不是真正的近代国家，而是“疑似近代国家”。（参见《最新右翼辞典》序言）

从堀先生的话里，我们也可以明白，不要期望日本右翼消失，我们需要正视日本右翼的存在，需要深入研究日本右翼的生成、演变和影响。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右翼在其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日本右翼呢？我对此深深怀疑！人云亦云的说法太多，有意无意的误解、曲解更多。在现实的中日关系中，日本右翼的作用也被无意有意地过分强调了，这对于千千万万正在坚持和右翼斗争的日本进步力量来说，起码是件很失礼的事。正是有了进步力量的坚持和牺牲，右翼才不至于像战前那么嚣张、上蹿下跳、为所欲为。

基于此，几年前，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步平、荣维木、卞修跃三位先生，南京大学的张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

张连红教授商量，大家合作编辑出版一套《日本右翼丛书》，诸位先生对此都很有兴趣，也觉得很有必要，特别是步平先生，出版过日本右翼问题的专著，也熟悉中日两国的右翼研究，对此建议非常支持，认为不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也应该翻译出版，以供国内学界参考。后来步先生建议放入本丛书，并提供出版资助，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经商议决定，先出版介绍战前右翼的著作，因为从战前战后历史的连续性来说，要研究战后右翼，不了解战前右翼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饱尝日本侵略苦难的中国来说，了解战前日本是怎样在右翼的大力煽动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更是非常必要。

于是，我们选中了堀幸雄先生的《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但是，出版该书的三岭书房已经倒闭，在版权问题上，除了征得作者的同意没有别的选择。所幸，堀先生是我以前的同事，在他从我们大学退休前，我已经建议他在中国出版其右翼研究著作，他表示了很大兴趣。在决定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后，我找到住在神奈川县逗子市的堀先生，承他慷慨允诺，使本书得以在国内顺利出版。

对于堀幸雄先生的右翼研究，日本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虽然有人指责他从极左的立场评判右翼，但大多数学者和读者还是认为他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其淡然不受政治立场影响的笔致也很获好评，对有关资料的收集更是得到了各方的一致称赞。

在日本从事右翼研究，不是一点风险也没有的。如果惹恼了右翼的人，被报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堀先生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受到过右翼的骚扰或者威胁。看来，连右翼对他的研究也比较认可。但这绝不是说，他的立场倾向于右翼。从前边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右翼的反对是明明白白的。

步平先生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责任编辑徐志民、徐思彦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表示深深感谢。日本问题专家、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熊达云先生慨然承担本书的翻译，非常感谢。由于熊先生教务繁忙，我代为通读了译稿，有些

不太明白的地方，对照原文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本书使用的有些概念，日语和中文的含义有时会有所不同，特别是作者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不一定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我们也不能苟同，但为了保持原意，我们没做任何修改和删节，请读者鉴别。

堀幸雄先生一直关注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多次给我打电话了解出版进展，表示能在一个拥有大量潜在读者的国度出版自己的著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去年的12月23日，年老体弱的堀先生遽归道山，没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不过，我想如果读者能通过这本书，了解日本战前右翼的真相，也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高士华

2010年4月30日于日本仙台

序 言

本书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出现的国家主义运动史著作。十年前，笔者曾撰写过《战后的右翼势力》，主要目的是追踪战后日本右倾化的轨迹。同时，我也注意到了战前的右翼，其实这是对走向战争轨迹的关注。右翼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正是我开始撰写本书的原因。两本著作出版的顺序虽然相反，但合起来就是一部关于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通史。

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日本后来似乎总是不断地把向海外扩张作为自己的目标。毋庸讳言，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筹划着对外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前的日本就是一部对外扩张及其遭受挫折的历史。日本对外扩张的时期肇始于向台湾出兵、江华岛事件，止于吞并韩国。至于出兵西伯利亚以至日本战败则是其遭受挫折的时期。前者为国家主义运动的第一期，后者为第二期（附带而言，第三期始于1945年战败投降迄于1989年的反共时代，此后则可以成为第四期）。毋庸讳言，第一期乃由国家谋划扩张，即对外侵略的时期，而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民间右翼玄洋社、黑龙会。这一时期我拟称之为大亚细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思想乃至意识形态就是在倡导亚洲团结的同时主张由日本当亚洲的盟主。

反明治维新的反动时期以西南战役的失败告终。此后，日本便

开始了重新探索建设新日本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平等关税和治外法权阻碍着日本的发展。这就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的剥削。摆脱这种剥削的道路之一是推行西化政策。与此同时，面临着殖民地化危险的清朝以及受清朝支配的朝鲜半岛成了日本关注的重点。韩国既不愿意承认明治政府，又继续着对清朝的依赖。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意义极其有限，而且作为一种对抗措施出现的便是“富国强兵”政策。但是，明治初期的头十年还处于混沌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国内路线还没有确立，自由民权运动正与藩阀政府闹对立。不过，藩阀政府的力量很快就抑制住了自由民权运动，颁布了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后发国家”的日本企图挽回它的落后，其方法就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和向朝鲜半岛扩张。玄洋社及其嫡系黑龙会则充当了扩张政策的急先锋。与这两个右翼对抗的并非左翼，那是因为在明治时期还没有出现对抗右翼的左翼、社会主义。与右翼对抗的不是国内势力，而是欧美势力。曾经与之对抗的藩阀政府在1890年代以后也已经成为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同志。反对西化政策而高涨的是国粹主义、日本主义。

总之，这个时期右翼以及国家主义这种说法都尚未成型。玄洋社把从自由民权运动转变为右翼的方向变化称为“国权主义”。所谓国权主义就是确立国家主权。据《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的综合研究》介绍，“回顾我国右翼团体的盛衰，可以看到早在明治时代就有以发展我国在大陆利益为目标的玄洋社（1881年2月成立）、黑龙会（1901年1月成立）两个团体，但它们的目标是专门推动我民族在大陆的发展，与最近出现的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对立的革新型国家主义稍异其趣”。^①文中所说的“最近”是指大正8~9年（1919~1920）以后的右翼团体。也就是说，第一

^① 斋藤三郎著，收入《现代史资料4·国家主义运动1》，三铃书房，1963，第22页。

期的右翼与第二期的右翼存在着质的区别。例如，木下半治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右翼运动称为“国家主义运动前史”，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两者之间存在质的区别。^① 玄洋社和黑龙会是与明治时期对外扩张相对应的右翼团体。当然，木下在自著《日本的法西斯》中作了以下的时代划分。“作为其‘前史’，我拟作如下划分：（1）从明治维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2）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社会大转折时代；（3）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 革新右翼运动的发展时代；（4）满洲事变引起的第二次社会大转折时代（军部的扩张和五一五事件、工人团体的集体转向），这一时代的顶峰是二二六事件；（5）所谓‘支那事变’即中日战争的爆发；（6）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纳粹德国的初期胜利，受其影响，日本出现了日本式纳粹 = 新体制运动及其挫折；（7）日本战败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面没落；（8）战败后的新国家主义运动”。^②

可是，扩张政策在 1920 年代走进了死胡同。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凡尔赛条约规定的现状，也就是说战后世界的固定化，以及国内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许多矛盾，例如劳资纠纷及租佃纠纷频繁发生、经济不景气等等。正如大川周明“日本比中国危险”的警告所象征的那样，从这一时期起，日本也萌生了有异于玄洋社、黑龙会的新型右翼。可以说这是对新危机的应对行动。反社会主义性的、诉诸暴力的、幼稚的右翼团体不断出笼，而且，受旨在开展新的“革新”之犹存社的成立影响，右翼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即是其表现。另外，北一辉撰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右翼当做教义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它的目标是通过政变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在整个 1930 年代，连续发生了通过政变、恐怖活动来进行的国家改造运动。扩张政策的挫折使人们把眼

① 木下半治：《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1939 年初版，1971 年福村书店将其分成两卷再版。本文以及后面的引文均出自再版。

② 木下半治：《日本的法西斯》，图书刊行会，1977，第 114 页。

光投向了国内的改革。当然，作为革新派的军部并没有放弃扩张政策，所以与国内改造相联系发动了满洲事变。这是走向破灭的第一步。在这一时期即战争期间是国家改造或者是国家革新的时代，一般被称作法西斯时代，或曰超国家主义的时代。

但是，国家改造中出现了两条路线的对立，从而混乱不断。一条路线是日本主义（皇道主义），另一条路线是国家社会主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农本自治主义、协同主义等，但主要的是前述两条路线。毋庸讳言，日本主义就是主张按照日本精神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但是日本主义极其抽象，几乎无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则主张以国家为基础，抑制资本主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实现国家的一元化。这些革新派（右翼）势力虽然相互攻讦，但都把重视与各国协调的集团视为维持现状派而加以非难和敌视。国家改造被视为昭和维新，开始了对满洲的侵略。他们认为这是“先外后内”，即先在外（满洲）开展革新，然后影响国内。来自北方的社会主义、蹈海而来的民主主义被革新派视为严重危机。

丸山真男把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走向法西斯的准备期，始于大正8、9年（1919～1920），迄于满洲事变；第二阶段为成熟期，是激进法西斯的鼎盛期，始于满洲事变后，止于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至战败为第三阶段，是日本法西斯的完成期。^① 第一阶段是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它们来哺育国家革新运动。第二阶段叫嚣昭和维新以及非常时期，连续出现来自左翼的转向，运动达到高潮，但同时日本主义派和国家社会主义派的路线对立也趋于激化。在军部则是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最后，统制派通过二二六事件掌握了主导权。此后，民间右翼甚至被视为障碍物。不过，军部、官僚希望实现的举国一致或统制国家的目标不

① 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的思想与运动》，收入《增补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第32页。